

独十师解放抚顺之战

盛雷

1948年10月下旬，辽沈战役进入到决胜的关键阶段。30日傍晚，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师在执行作战任务途经抚顺时，发现敌情突变。经过师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主动放弃原定作战计划，转而突袭抚顺。在夜幕的掩护下，独立第十师仅用6个小时便结束战斗，“煤都”抚顺回到人民怀抱。

抚顺解放之战，不仅拔掉了威胁人民军队解放沈阳的背后“芒刺”，而且极大震慑了沈阳守敌，加快了辽沈战役胜利的步伐。



独立第十师向抚顺浑河南岸城区突击

临机决定，突袭抚顺

10月23日，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奉命自长春南下，参加解放沈阳的战斗。作为兵团前卫部队，独立第十师的作战任务是急行600里，直取工业重镇本溪，协同兵团主力堵截敌军自沈阳南逃营口的退路。为避免打草惊蛇，防止敌军识破我军迂回穿插包围沈阳的意图，第1兵团司令部命令独立第十师绕过抚顺，火速南下。

然而当30日傍晚部队抵达抚顺东郊时，天公不作美，连日秋雨导致浑河迎来秋汛。蜿蜒奔腾的浑河横穿抚顺，此刻却成为“拦路虎”。原本全师准备在抚顺东郊下章党地区浅滩渡河，然而此时水位上涨，平均深度达1.5米，水流湍急，水温较低，附近无桥梁无渡船。人马勉强可以泅渡，弹药辐重无法通过。

就在这时，前方发来两份战报，战场形势突变。一是安东军区独立一队于29日与本溪敌军交火，随即趁势追击，此时已经控制本溪大部地区，预计31日上午结束战斗。二是各主力纵队已经陆续抵达预定作战地点，沈阳之敌南逃的退路已经完全堵截，解放沈阳的战斗一触即发。

由于事态紧急，独立第十师立即召开师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应对方案。师长赵东寰指出，如按照原定计划强渡浑河，抵达本溪时战斗已经结束。如就地等待上级命令，极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沈、抚之间相距不到100里，一旦抚顺之敌铤而走险，从解放军的包围圈外发起偷袭，继而与沈阳守军会合，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权衡利弊后师党委果断决定，放弃攻取本溪，转而突袭抚顺。与其劳师费力赶赴本溪而后无功折返，不如就地解放抚顺，拔掉这根威胁我大部队背后的“芒刺”，消灭抚顺之敌比拿下本溪更有助于主力部队解放沈阳。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赵东寰决定，一面向兵团请示报告，一面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扬我军英勇顽强的优良作风，利用夜幕掩护，主动出击，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出敌不意，解放“煤都”

抚顺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座既能产煤、又能产油（煤油）、还能发电的城市。沈阳的煤、电供应均依赖于抚顺。正因如此，辽沈战役发起后，国民党势力派重兵驻守抚顺，妄图依靠坚固的城防工事抵御解放军的进攻。

此时侦察部队传来的消息更加坚定了独立第十师解放抚顺的决心和信心。廖耀湘兵团被解放军围歼后，原先驻守抚顺的国民党第六军第二〇七师紧急回防沈阳。目前驻防的敌军为沈阳守备总队第一师，该师6000余人，系由地方保安部队临时拼凑。一部驻扎在抚顺西郊，一部在浑河北岸城区东侧高尔山，依托地形和工事据守，预备队则在浑河南岸城区。

由于解放军仅有8000余人，赵东寰决定利用敌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在局部形成对敌军的压倒性优势，自北向南、由内而外推进，各个击破，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战斗由第二十八团担任主攻，在抵达市内横跨浑河的大桥——永安桥后，第二十九团作为生力军加入战斗，继续向南突击，不给敌军喘息之机。第三十团为预备队。另外派出小股部队，袭扰外围敌军据点，制造解放军第一兵团主力围攻抚顺的假象。

10日凌晨1时许，随着第一兵团司令部新的作战命令到来，抚顺解放之战正式打响。由于我军行踪隐蔽，敌军始终未能发觉。第二十八团指战员如神步兵天降一般，突然出现在敌军面前，仅用两个小时便控制浑河北岸城区。由于我军行动迅速，敌军苦心经营的混凝土工事并未发挥多少作用，大批敌军在睡梦中惊醒后旋即成为我军俘虏。有俘虏惊叹道：“本来侦察抚顺东并无解放军活动，你们不仅来得好快，而且仓促下手

于沈阳之前，真出乎意料！”

凌晨3时许，当解放军攻克永安桥北桥头之际，惊魂未定的敌军展开凶猛反扑。位于南桥头的碉堡群不断向我军喷射火舌，敌军试图抢回北桥头。随着第二十九团及时抵达战场，敌军的3次反扑均被打退。随即我军组织突击队猛扑南桥头，战士们前赴后继，终于将永安桥这座浑河上的交通大动脉牢牢控制。

凌晨4时许，解放军在浑河南岸琥珀泉山上发现敌军指挥所。经过激烈的短兵相接，敌军师长周仲达被解放军生俘。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第二十八团团长段志清对其审讯时，意外获知二人为旧相识。1936年11月山城战役，时任国民党第七十八师某部班长的周仲达被时任红一军团某部排长的段志清俘虏，后来又趁乱逃跑。此刻周仲达惊愕之余，耷拉着脑袋，连忙说道：“这次真不跑了。”

尽管敌军指挥所被解放军基本捣毁，但是仍有顽敌依托工事，困兽犹斗。对此，解放军一方面持续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加强政治攻势，向敌军宣传党的政策。在军事、政治双重攻击下，敌军残部眼见大势已去，相继放弃抵抗。而驻守抚顺西郊的敌军在向沈阳方向逃窜途中，被我军击溃。

至早上7时许，“煤都”获得解放。此役，独立第十师仅用6个小时，歼敌4300余人，缴获大量作战物资。抚顺解放之战，也成为我军历史上一个师歼灭敌军一个师的经典战例。战斗结束后，我军迅速接管抚顺发电厂，拉闸断电，停止向沈阳供电。这一举措极大震慑困守沈阳的敌军，进一步瓦解敌军意志，加快辽沈战役胜利步伐。

连获嘉奖，再踏征程

抚顺解放后，如何将城市保护好、

接管好，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艰巨的组织工作，其影响力不亚于军事斗争。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下发的《关于接管城市问题的指示》，赵东寰命令各部队按照作战区域驻防，就地做好市政设施、工矿企业的守卫工作，等待接管人员到来，不得私自接收收产。要严格遵守城市纪律，紧密依靠工人阶级，及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做到既要解放抚顺，更要保护抚顺。

31日下午，第一兵团司令部抵达抚顺，兵团首长萧劲光、萧华等人对独立第十师的表现予以高度肯定，并通令嘉奖。

11月1日下午，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来嘉奖令，不仅对独立第十师指挥机动、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予以高度肯定，而且对其拉闸断电的机智举动予以称赞。对此，赵东寰向司令部首长表态：“我军总攻沈阳开始后，部队打到哪里，抚顺的电就立刻送到哪里，哪里就有了光和热。”11月2日沈阳解放，抚顺恢复正常供电、供煤。

战后，师长赵东寰对抚顺解放之战的经验进行总结，认为部队之所以仅用6个小时解决战斗，原因有三：第一，心中有数是根本，全面、准确地掌握当前的作战目标，及时了解敌我双方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切情况；第二，出敌不意是前提，利用夜幕掩护，乘敌不备、攻其不备，从敌人工事坚固但却戒备松懈的高尔山发起进攻；第三，灵活使用兵力是关键，坚持灵活机动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作战指挥原则。

为了表彰独立第十师在辽沈战役期间的突出贡献，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于12日下令，将其编入三十八军建制，番号第一五一师，对此全师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廖仲恺用一席话增进团结

徐轶

1924年11月20日，黄埔军校组建了教导团，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担任军校战术总教官何应钦担任该团团长、王登云为党代表，以黄埔一期毕业生充任各级官佐、干部和党代表。黄埔军校教导团依照苏联红军建制，实行“三三制”原则，团辖3个营，营辖3个连，连辖3个排，团直属包括：特务队、卫生队、侦察队、通讯队、辎重队及机关枪连。教导团编制隶属于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官佐、干部可以在教导团和黄埔军校教学、行政机构之间进行流动，教导团的教育、管理、官佐薪饷等都由军校来安排和调度。

12月26日，军校又组建教导第二团，由军校教育部主任王柏龄担任团长、张静如为党代表。

对于如何处理好党代表和军事主官的关系，廖仲恺经常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召集党代表开会，听取工作汇报，帮助解决问题。教导团成立后，“当时党代表与主官因权责之争执”“往往发生感情上之冲突”。

一天，廖仲恺来到教导团

二团，召开团军事官长和党代表会。会上，他听取了双方关于在工作中总有“摩擦”的汇报后，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问大家：“你们说我与你们的校长（即蒋介石）搞得好不好？”大家说：“很好”。他又问：“何以见得？”大家说：“从未看到您和校长争吵过，校长和您在一起时，总表示出对您尊敬的态度。”

廖仲恺听罢笑着说：“你们说的，既对也不对。我如果10次来校，有8次要争吵，地点在校长家里，没有第三人在场。当他在一些不同意见的问题上，特别是为了学校经费问题，面红耳赤地向我吵闹时，我总是平心静气、一言不发地听他吵，有时还点头称是，等他平静了，不讲了，我问他讲完没有？他有时会笑笑说：‘我讲完了，你也谈谈。’于是我安静地谈了我的意见，谈了我的困难。最后总是他谅解我，听我的话。你们说他尊重我，这不假，但这是我争取来的。”

廖仲恺的话，让在场的人顿生敬意。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玉皇顶起义

果学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10月，中共山东掖县党组织领导人郑耀南在掖县整顿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在国民党东北军搞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家洛，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也从济南回到家乡掖县。10月下旬，中共掖县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每一个分区都要建立一支半公开的抗日武装。

1937年12月，中共掖县县委为了统一全县各派抗日武装，派张家洛、李勳臣等人代表县委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与国民党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谈判，于28日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统一的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掖县6个分区普遍建立抗日武装。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掖县县城。进城后，日军委任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刘子容为掖县县长，网罗了一批汉奸、土匪、兵痞、帮会分子，组成伪县政府和伪保安队、伪公安局。伪县政府成立后，下令取缔一切抗日组织。

针对刘子容的反动行径，中共掖县县委研究决定，以“抗敌除奸，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并迅速建立军政抗敌政

府”为中心任务，利用一切关系争取各区区队，在各乡镇村成立自卫团。县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争取了二区队、六区队、七区队和其他区队各一部分同意接受“民动”领导，参加起义。

1938年3月8日夜，起义各部准时到达玉皇顶。玉皇顶位于掖县县城城北，是一座方圆一里多地高高凸起的圆形大岭。起义指挥郑耀南下达了“武装起义，攻打掖县城，活捉刘子容”的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奋勇向前，兵临城下，把县城团团围起来，并切断了县城的对外联系。刘子容向日军求援，无奈电话不通，只好下令死守。

9日，郑耀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军事包围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一面组织战士对城内喊话宣传。一时间“中国人不当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四起，瓦解了守城伪军的军心，伪军头目表示认罪，并下令打开城门。起义部队进城后，很快缴了伪保安队、伪警卫队的枪，占领了伪县政府，救出了被关押的群众，活捉了刘子容。上午10点，掖县县城宣告克复。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南下支队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

孟伟

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队和一批干部约5000人，由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率领，从延安出发，突破日军和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向湘鄂赣边区挺进。南下支队首先胜利通过日军和阎锡山联合在山西同蒲路设下的封锁线；继而渡过黄河，击溃日军在河南鲁山的阻击，与孤悬华中敌后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接着南渡长江，在湖北阳新三溪口突破日军防线，消灭敌军400余人。转战数千里，队伍得到扩大，于1945年3月，北上，抵湖北崇阳、通城地区。在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旅长张体学率两个团配合下，开辟了鄂南地区并着手开辟湘北地区。

3月23日，部队进军湖南，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将所属各大队改为支队。26日，部队攻下平江县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4月13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在江坪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区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以便更好地开展湘鄂赣边区的各项工作。会议内容，经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联合署名电告中共中央与鄂豫边区党委。5月4日，毛泽东电示

王震，王首道并告郑（位三）、李（先念）：“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接到这个电报后，中共湘鄂赣边区党委（书记王首道）、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主任聂洪钧）、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王震，副司令员张体学）公开成立。6日，湘鄂赣边区党委在通山山日铺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边区的发展建设与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行动方针：决定由司令员王震率第一、第二支队和第五、第六支队一部向湘北挺进。王首道、张体学等人率直属机关，第三、第四支队及鄂南军分区武装，歼灭境内敌人，发展、建设湘鄂赣边区。

湘鄂赣边区党政军组织建立后的不到1个月时间里，王首道等人率部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后消灭公开投敌、卖国荣成的成果所部1000多人，日伪武装特务阮宝珊所部200余人，击溃武装特务马钦武所部1000余人，消灭顽匪王勇波所部800余人。鄂南日军不敢应战，只是龟缩铁路、公路沿线的各据点中，仅求自保。不久，整个鄂南境内的广大农村地区，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新四军新张家设伏歼敌

贾晓明

支顽军的嚣张气焰，新四军二师师部决定：以四旅十一团强攻大桥镇，歼灭侵占大桥镇的顽军；为阻援敌于外围，确保主攻部队行动，师部同时以六旅十六团配置于大桥镇东南的新张家一线，伏击从广兴集、界牌集方向出援大桥镇的顽军。

11月17日凌晨，六旅十六团整装出发，向集结地隐蔽行进，迅速前进至新张家，悄悄占领了坐落在一个高岗子上的普益公司附近地带。

十六团的指挥所就设在普益公司。团部和3营400余名指战员秘密隐蔽在大桥镇外的围沟、旱壕之内。

17时许，桂系顽军第一七一师五一团1个加强营，从广兴集、界牌集出发，向大桥镇驰援。十六团侦察排发现后，采用麻雀战的战术，和顽军接战，并边打边撤，诱敌向普益公司方向追赶。顽军连续“击败”新四军的“阻击”，以为新四军不过如此，于是加快了追击脚步，被新四军“牵着鼻子”，跑步进入了伏击圈。

当顽军尾追侦察排进入伏击圈时，

十六团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即开火，一时间打得顽军晕头转向。但顽军战斗力较强，不一会儿便举枪抵抗，并企图夺取普益公司附近制高点。三营已在制高点架起了5挺机枪，向冲上来的顽军密集射击，打退了对方的进攻。指挥员见顽军又向二营的方向逃窜，立即命令三营出击，夹攻顽军。随着军号响起，指战员跃出工事，从三个方向扑向顽军，很快歼灭顽军大半，并将顽军残部压缩在普益公司和新张家之间的开阔地上。这时，一营和特务连在消灭了殿后的顽军后，出其不意地在顽军侧翼出现，一阵猛打，俘顽军百余人。残余顽军在营长的指挥下窜入新张家，在村庄上紧急构筑工事，妄图利用民房做最后的挣扎。

十六团迅速调整部署，命二营、三营担任警戒，一营围歼新张家之顽军。激战至午夜，残敌大部分被歼，只有顽军营长率领部分残兵，依托重机枪的火力继续负隅顽抗。一营二连担任了最后解决战斗的任务。经研究，连长决定用火攻消灭顽军。奋勇队在机枪火力掩护

下，猛冲到顽军占领的屋前，迅速点燃房檐草，并把当场缴获的燃烧手榴弹投向顽军据守的房屋屋顶，接着又向烧开的屋洞里猛投手榴弹。见顽军被打得死伤过半，这时，二连指战员又对顽军展开政治攻势。残敌听了后，抵抗逐渐停息。至18日晨，顽军营长即率领残部，从一片火光中走出盘踞的房屋，缴械投降。待收拢了俘虏，打扫完战场，东方已露出鱼肚色。

这次战斗，十六团全歼挂顽1个加强营。毙、伤、俘顽营长以下800多人。缴获高平两用机枪1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轻机枪12挺、步枪400多支、短枪12支及其他弹药、军需物资一部。路西联合指挥部代表二师，授予十六团“铁锤团”荣誉称号，颁发“铁锤团”锦旗一面。并授予十六团二连“攻无不克连”光荣称号。新四军二师的此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稳定了路西形势，提高了我军对顽作战的胜利信心和在西路群众中的声誉，使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篇后拾遗
PIANHOU SHIYI

1941年，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津浦路西根据地的形势仍很紧张。国民党顽固派桂系部队以1个师的兵力配以地方武装，向路西根据地多次进犯，还唆使土顽武装袭击根据地的新四军。日伪军常与顽军默契配合，对新四军发起夹击“扫荡”。新四军二师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坚持路西斗争，时而抗击日伪的“扫荡”，时而反击顽军的进攻和土顽的骚扰，而当遭到敌顽“夹击”时，则要两面应战。

1941年10月，桂系顽军一七一师五一团（欠1营）及土顽共1000多人，为策应国民党汤恩伯集团东犯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先后占领了津浦路西根据地的广兴集、周家岗和中心区的大桥镇等地。

为保卫路西根据地，狠狠打击这